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第一次合影（左一，晨光；左二，阿斗；左四，蚶蚶儿；左六，瓜子；左七，大耳朵）。



1972年时的李君旭。

编造“周总理遗言”的李君旭走了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一篇长达千字的所谓“总理遗言”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后来却发现这份“总理遗言”是一位23岁青年，模仿周总理语气炮制的。这一充分肯定邓小平、给全国人民带来希望的“谎言”，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2014年2月9日清晨，“总理遗言”的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长逝，却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逼真的假“遗言”

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这个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短短一年，已经给予全国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越刮越烈，“四人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也几乎趋于公开。

正是在时局如此微妙的时刻，一封直接肯定邓小平工作的“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被广泛传抄、传诵，影响甚至波及国外，世界各国许多电台、通讯社播发了“遗言”内容。

起初，完全没有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全国范围内将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来名字，笔法如此老练、逼真，造成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手笔！

他叫李君旭，外号“蚶蚶儿”，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的医学专家。英俊且才华横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龄人看作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众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但那份炮制的“总理遗言”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变成一个脑部受重创、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卧床二十余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袁敏著作《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就是当年的事件亲历者袁敏，对所有“总理遗言”案健在当事人的采访追述。

无辜的牵连者

尽管“总理遗言”完全是李君旭一个人的“虚构创作”，但这起重大政治案件却前后牵连了上千人。全国各地都有人因为传抄“遗言”而被通缉、监视、传讯。而被真正实施抓捕、进行“保护性审查”的核心成员除了李君旭，还有十一人，他们是：李君旭最要好的朋友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使用绰号是因为他们都不愿被提及姓名）；中学体育老师毛宁；李君旭的父亲；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瓜子的父亲及姐姐。

这十一个人里，没有一个事前知道是李君旭炮制了“遗言”，但却都被公安部门划定为“总理遗言”案的同谋和幕后策划指使者。他们无故遭受了数月或数十月的牢狱之灾，有的人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却至今都没能真正弄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被抓。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亲妹妹，同时也是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1976年春天，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亲被软禁家中，亲眼目睹身着白色警服的办案人员如何拥入自己的房门，滴水不漏地展开抄家行动。她们隔三差五被传讯，那一段几乎家破人亡的特殊岁月，刻骨铭心。

根据袁敏的采访、记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可以独自制造出如此的惊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推论，因此他们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轮番的疲劳审讯终于彻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说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引自《重》书第33页）。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内的十二个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其中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个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的天目山。

命运的大逆转

袁敏的三个亲人，都和李君旭一样属于被押送北京的“要犯”。他们并没有被送往监狱，而是关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据袁敏的哥哥和父亲回忆，那个牢房就在长安街沿线、白云路附近，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今公安大学）的校舍。

他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房间里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也不分昼夜地照着，不少人连续失眠，以致神经错乱，最后胡乱交代以求过关。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的7月28日，关在北京已经两个月的他们才第一次走出房间，看到天。

据说，他们原本都要被判处死刑。但1976年10月以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原本重权在握、下令对“总理遗言”案深入追查的“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伪造的“总理遗言”也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四人帮”战斗檄文，只不过所采用的方式欠妥。四个多月后，大部分无辜牵连者都被释放回家——唯独袁敏的哥哥瓜子，依然跟李君旭一起又被关了大半年。

当时的办案人员曾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蚶蚶儿的笔”。而现实中这两个人又的确是关系最为密切、命运相互纠结的生死朋友。

“遗言”催人泪下

不能说办案人员的推论全无道理。因为李君旭写的“总理遗言”中，很多内容的确受到了瓜子及其他朋友的启发。那是1976年2月上旬飘雪的一天，蚶蚶儿、瓜子、阿斗、大耳朵等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在农村插队的大耳朵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的狗肉，这些密切关注时局、担忧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政，他们谈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说文件宣布的高层人事变动里怎么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不知怎么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纷纷设想、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些什么。这原本是朋友间随意的谈话，没想到蚶蚶儿却默默记在了心里。回家后他经过消化、过滤、融合，又翻箱倒柜找出胡志明遗言，参考斯大林、列宁遗言等资料，精心“创作”出了那篇足以乱真的假遗言。

1976年春节过后，当大家再次聚会时，他不动声色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他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总理遗言”，请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是真是假。

现在回头来看，一切似乎不可思议：所有人在看过“遗言”之后的反应，都是兴奋地埋头就抄，然后再传播给周围的亲人、朋友。虽然也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大家都从心底里希望“遗言”是真的。

他们重获自由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重获自由，但很多人的命运已无法复归原位。最令人感慨的是蚶蚶儿和瓜子。他们此后的人生时时构成一种对照，一个张扬，一个低调，却几乎同时生起了大病，各自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1977年年底两人同时出狱。蚶蚶儿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由于公安部最后的复查材料肯定了李君旭“积极反对‘四人帮’”，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青年领袖，很快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随后他先后被提升为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才华引人注目。他和省市的领导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甚至传言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

但是这时候已经有人看出了他身体与精神的异常。他时不时会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半夜还曾起来梦游，从天窗爬进自己的办公室，留下大脚印，然后第二天自己又去报案说屋里进了小偷。原来，在被关押北京的18个月里，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药，逐渐形成了对药物的依赖，那种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1989年，他再次重重摔倒，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是瓜子把李君旭背到医院的。然而就是坐在抢救室门口等待消息的那一刻，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腿肿成了透明的棒槌——随后他被诊断患了肝肾综合征。十多年前那段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在他身体里埋下的隐患，由于用力过度，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2014年2月9日清晨，遗言的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长逝，却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总理遗言”油印稿复印件。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会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综合央视、《齐鲁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时报》、《时代周报》、《新民晚报》